

“一带一路”战略助力“中国式”输出

■ 张方波

本文以马克思关于经济社会细胞——商品、资本和货币的论述为理论支撑和突破口,验证了“一带一路”战略契合了“中国式”输出的经济内涵,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助力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货币输出的机制,该战略对于化解国内新常态下经济下行压力和应对国际复杂形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一带一路”;商品输出;资本输出;货币输出;三位一体

[中图分类号] F83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69X(2016)01-0028-06

张方波,湖北鄂州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政策研究处,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北京 100048)

一、“一带一路”战略契合了“中国式”输出的经济内涵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中亚和东盟期间先后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成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重要战略部署,这一顶层设计不仅在应对国内外复杂形势中找到了突破口和切入点,而且也为了“中国式”输出夯实了理论基础。同时在亚欧国家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可以激发该地区经济增长的活力和潜力。

1. “一带一路”在助推“中国式”输出上具有独特的历史规定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时提出了五个相通“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基本观点,为中国式输出奠定了基本的理论基础和三个维度:其中贸易畅通有助于商品输出,道路联通有助于资本输出,货币流通有助于货币输出,这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经济社会细胞三个维度的理论阐述是一致的:不论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其经济社会的细胞是商品、资本和货币,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其经济内涵有所不同而已。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资本和货币都被打上了“血与泪”的烙印,包含了许多不平等的因素。自然而然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的对外输出是为了建立有助于自身发展的不公平经贸关系。比如,20世纪40年美国主导的“马歇尔计划”,名义上是美国通过资本输出帮助战后国家恢复重建,但其实夹杂许多附加条件,使美国对接受国的经济政策产生影响,并不是纯粹的“普惠共赢”的对外经贸合作模式。而在当前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处于新常态经济背景下的中国,其推行的“一带一路”战略是在缓解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同时也为沿线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充分体现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发展“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因此,“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是通过助推中国商品、资本和货币三个维度的输出,在该区域范围内践行“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国家战略,通过“中国式”输出践行了普惠型的发展内涵,这就是“一带一路”战略在当前中国所承载的历史规定性。

2. “一带一路”战略体现了“中国式”输出的演进特征

“一带一路”战略关于三个维度输出的要旨提炼了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在对外开放上的演变历程:在对外开放的初级阶段,商品输出是一国对外输出的主要形式和载体;在对外开放的中级阶段,资本开始输出并且对外净投资和净资本形成正值;在对

外开放的高级阶段,货币开始输出,成为全球化重要货币体系中的一个支柱,同时本币也开始成为国际化货币。抛开资本主义社会浓重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动物精神,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历经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和金融资本垄断时期,也伴随了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进而向货币输出的演进特征。当前中国在商品输出上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并在2012年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因此已经越过单纯依靠商品输出的阶段,开始进入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而“一带一路”战略中提出的五个相通,指明了中国三个维度上的输出存在递次规律,在肯定商品输出阶段取得成果的同时,通过制定资本输出和货币输出的顶层设计来提升中国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内涵。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具有深厚的市场基础。沿线国家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总人口大约为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占据全球的63%和29%,并且这些国家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3.1%。同时,该区域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仅2012年达到34.5%^①。在后危机时代,对外贸易和外资净流入的增长速度分别高达13.9%和6.2%,高出全球平均水平4.6和3.4个百分点。因此,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和市场规模巨大为中国进行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货币输出提供了重要的吸纳场所。

总体来说,“一带一路”战略在助推“中国式”输出方面不仅具有特殊的历史规定性,而且践行了平等互助的合作精神,同时也指明了当前中国对外开放和建立对外经贸关系所处的阶段,为后续的对外开放和更好地融入全球化治理和建立多双边合作提供了顶层设计,这即是“一带一路”战略契合了“中国式”输出的逻辑所在。

二、“一带一路”战略深化商品输出

1. “一带一路”战略深化商品输出恰逢其时

全球经济危机后,发达国家经济一直处于深度调整之中。以美国为代表,其“再工业化”战略部署的实施使得它的国际需求较为疲弱,同时欧洲国家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以提振国内经济的行为产生了严重的负外部性,这就自然而然地重构了中国的出

口市场。其次,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出现分化,多哈回合谈判因西方发达经济国家在农业上的保守态度导致进展较为缓慢,加之WTO为主的多边机制遭到进一步的削弱,在协调国际经贸问题上仍显不足,在此背景下美国通过已经或即将制定新的更具排他性、更高标准贸易和投资规则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P)^②、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以及服务贸易协定(TISA),将会严重损害我国在后危机时代的出口贸易规模。

从国内形势来看,当前中国进入“新常态”的关键期,经济下行压力凸显,造成供需的严重失衡。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降低对欧美等发达国家国际市场的依赖,化解国内过剩产能,让中国商品在“一带一路”周边国家更大范围内实现“惊险的跳跃”,同时也为我国打造新型开放经济体和形成新一轮对外开放新格局,并提高内陆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力度和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落实恰逢其时。

2. “一带一路”战略降低商品输出的交易成本

2015年3月28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推出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提出的“贸易畅通”,即是指该战略通过布局“点”“线”复合交叉式交通网络降低商品的交易成本,从而在沿线国家双边或多边之间实现贸易便利化的格局和有利于商品的输出。

从“线”上看,一带一路不仅包括新亚欧大陆桥,通过公路、铁路在东西方向贯穿东亚、中亚、西亚和欧洲,在南北方向上通过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对接“草原丝绸之路”连接东北亚的蒙古和俄罗斯,而且包括海上通道,联通欧亚大陆与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形成陆海一体化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大动脉。

从“点”上看,在新亚欧大陆桥这一陆上通道上,成立许多沿线支点城市作为支撑。根据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发布的《“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研究报告2015》,支点城市具有区位优势、集聚辐射、杠杆支撑的特征,充分发挥支点在沿线上的重要支撑作用,并将北京、上海和深圳列为

①张茉楠,全面提升“一带一路”战略发展水平,宏观经济管理,2015,(2):20-24.

②由于美国的TPA(贸易快轨授权)已经于通过国会,有理由相信后续贸易规则如TTP和TTIP很快达成共识。

前三名支点城市,目标在于根据这些国际性大都市的比较优势,将它们的辐射效应在贸易层面发挥。在海上丝绸之路,由于沿线里程长,因此需要充分发挥我国的港口优势,通过营口港、大连港、天津港、日照港、连云港、南京港、上海洋山深水港、宁波港、泉州港、厦门港、珠海港、北部湾港和重庆港等对接“一带一路”,将这些港口建设成为国际中转港,提高商品输出的便利性和节省贸易成本。如此一来,通过发挥重要支点城市和港口的支撑辐射和缓冲作用,使一带一路的交通网络效应更加明显。

在助推商品输出的区域协调机制建设上,东部地区可以参照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模仿和复制其经验,在沿线地方建立自由贸易园区或港区,形成一系列有机结合的自由贸易区体系,消除贸易中存在的壁垒和市场准入门槛,推动更多的商品走向国门。中西部地区需要借助于国家的战略支点功能,在长江经济带建设陆桥经济带,构建商品运输和转移的高地。

“一带一路”的布局由于具有“点”“线”结合的交通网络分布特点,大大降低了我国商品输出的交易成本。以中波贸易为例,在“一带一路”建设后,中国与波兰之间贸易的海运时间仅需要35~40天,铁路运输仅需要12~14天。

3. “一带一路”战略有助于提高商品输出的效率

“一带一路”战略使得中国通过陆海两条通道与沿线国家形成互联互通的格局,改变了中国原先商品输出的路径,使得商品在更多的国家不通过转口贸易而直接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交易,拓展了中国式商品输出的路径和渠道,以及扩大了商品输出的半径。

中国对这些沿线国家的出口与进口形成互补性,有助于提高交易的效率,提升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福利。以中亚为例,该区域国家出口商品主要以矿产资源、能源和农副产品为主,中国对这些国家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机械设备以及高科技产品等。这与中国出口商品在结构上形成了互补性。根据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与沿路国家的贸易总额占外贸总额的15%,直接投资占据4.5%。自2014年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规模达到7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了7%,占同期我国进出口规模的25%左右。

三、“一带一路”战略带动资本输出

“一带一路”战略中强调“道路相通”,是指需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互联互通,这为中国进行资本输出提供了指南。资本输出包括实体经济中的产业资本输出和虚拟经济中的金融资本输出,其宗旨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构筑“一带一路”的交通网络和经济基础,减少经济运行中的摩擦力和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

在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中国积累了扎实的资本基础,这些规模巨大的资本需要找到合适的载体和场所进行增值保值,以满足作为资本属性的需要,否则会形成资源的无效配置。考虑到当前中国在经济“新常态”进行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大规模投资拉动内需的可能性较小,同时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周边国家转移,开始新一轮的“雁阵”转移周期,新一轮技术革命尚未在中国实现,在国内通过资本与劳动力等相结合而构筑的生产方式效能将逐步递减。因此,通过国内资本与沿线国家低成本的劳动力进行有效结合,有利于改善生产函数的结构和提高生产效率,实现了帕累托改进,这均符合中国与沿线国家的需要。

1. “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产业资本输出

从实际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结构主要是以原材料、能源和矿产等初级产品为主,像中亚、东亚、东欧等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铁路、水运、航空、港口口岸、机场等立体式走廊,煤电、水电、油气、风能、太阳能等能源大动脉以及通信管网、电信设施、互联网等信息化建设均较为薄弱,同时对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钢铁、建材、有色、工程机械等产生了引致性需求,非洲在金融服务、产业发展、生态环保等方面均较弱,而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高铁、钢铁制造业、运输设备制造以及电力等。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如国际工程承包商、中国机械工程企业、中国中铁、中国电建企业等具有丰富的海外投资经验,这些比较优势对于完善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商务部在2014年出台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的实施,确立了“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管理模式,使得对外投资更加便利化,减少了之前企业为了通过审批所花费的“脚底成本”,从政策上为我国对这些国家的资本输出提供了保障。

此外,国家领导人对沿线国家的访问与谈判,进一步为资本输出扫清了障碍。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北京与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签订了中哈加强产能与投资合作备忘录,涉及钢铁、有色金属、平板玻璃、炼油、水电、汽车等众多领域。

在沿线国家对资本输出的强烈需求与政府对资本输出提供政策供给的支持下,内陆延边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共同打造“一带一路”投融资平台,比如建立内陆延边地区企业对东南亚、南亚和阿拉伯国家的跨境投资平台机制。

根据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拟建和在建基础设施已高达1.04万亿元,跨国投资规模约534亿美元。2015年1~5月份,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48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合计48.6亿美元,主要投资国家有新加坡、印尼、老挝、俄罗斯等^①。鉴于基础设施建设周期较长,可以预测2015年国内“一带一路”的投资额度约为3000亿~4000亿元^②。此外,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发布的2013年报告中的预测,累计到203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大致为57万亿美元,其中公路和电力将占据绝大部分,而这些投资中将近一半集中出现在沿线国家。

2. “一带一路”战略下的金融资本输出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在进行产业资本输出的同时,也必须进行金融资本的输出。根据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模式的特性,货币资本^③、生产资本与商品资本在时间上继起和空间上并存,预示着货币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客观存在性。这即是说,产业资本输出的同时也会伴随货币资本的输出。该战略提出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通过各种载体输出金融资本,并且将金融资本导入产业资本所需积累的领域,大体上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金融资本输出:

从国内看,各大金融机构向沿线国家提供各项贷款。中国工商银行“一带一路”境外项目贷款就高达109亿美元。2014年国家开发银行向“一带一路”周边29个国家累计贷款超过1200亿美元,进出口则提供超过200亿元人民币的项目贷款,这些项目涵盖高新技术产品、基础设施建设、机电产品以

及大型成套设备等等。还有,中国银行监事长李军在出席重庆举办的中国银行服务“一带一路”助推“渝新欧”国际贸易客户现场对接会时强调,2015年中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授信规模将不低于200亿美元,未来3年将力争达到1000亿美元。此外,2015年6月24日,中信银行联合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信信托、中信建设、中信重工、中信国安等多家中信集团下属公司将投融资7000多亿元助力“一带一路”战略。其中,中信银行提供超过4000亿元融资。

从国际上看,中国基于庞大的外汇储备(其中2014年的外汇储备规模为3.84万亿美元),成立多边投融资平台,成为金融资本输出的重要机制和载体。一是2014年10月成立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AIIB),中国认缴资本为500亿美元,持股50%;二是成立了丝路基金,为丝路基金注入400亿美元。这些投融资平台一方面为中国外汇储备找到合适的投资场所,使得外汇储备投资标的多元化,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也有助于输出到沿线国家形成产业资本。

通过各种方式进行金融资本的输出,不仅打通了储蓄——投资之间各个环节的传导机制,比如中国积累的外汇储备无法在国内形成资本;国内前期刺激性的政策供给导致大规模投资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满足了沿线国家的资本需求,体现了中国与沿线各国在经济合作中“互利共赢”的精神内涵。

四、“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货币输出

牙买加体系的建立,形成了一种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向发展中国家低成本输出货币的机制^④,使得发展中国家出现“美元原罪”,也即是陷入了罗纳德·麦金农式的“两难困境”:新兴市场经济体通过出口贸易获得的美元无法在本地使用和进行直接投资。“一带一路”战略,让人民币在沿线国家成为有重要影响力的货币,从而也减少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中的结算支付所产生的二次汇兑风险和套算成本,促使中国这一发展中国家向全球输出货币,

①来自《金融时报》2015年6月19日。

②每日经济新闻,资金融通推动“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提速。

③根据《资本论》可知,货币资本属于金融资本的一类,货币资本与货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④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这一体系导致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的供给受到黄金储备的制约,因而并非低成本的。

从而有助于实现国际货币体系的平衡和完善国际货币体系^①,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由不成熟的债权国向成熟的债权国转换。“一带一路”战略在推进货币输出方面主要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

1. “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经常项目下的货币输出

商品输出与货币输出相辅相成。中国是资源型产品需求大国,而沿线国家尤其是中东、非洲的石油,俄罗斯的天然气,乌克兰、印度的非能源矿产能满足中国的需求。“一带一路”战略以来,尤其是2014年四季度以来,大宗商品价格开始出现暴跌,对于推进经常项下人民币输出提供了重要的外围环境,可以通过海陆两条大动脉,从沿线国家进口所需的资源性产品,同时价格暴跌有助于中国可以成为买方市场,从而有助于人民币在大宗商品中的计价和支付结算,改变以前大宗商品单纯依靠美元进行结算和支付的格局和惯性,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化影响力。

2. “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资本项目下的货币输出^②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明确提出“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鉴于沿线国家大部分为欠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度较低,内源性融资规模有限,外源性融资渠道较为单一,可以考虑优先允许重点合作和拓展的沿线国家在中国大陆境内发行熊猫债,鼓励融资主体更多地使用人民币进行计价和结算。同时根据沿线国家的特点探索建立国内债券的新品种,如伊斯兰债券、丝绸之路大型合作项目特种债券。

在2015年中国上海陆家嘴论坛上,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方上浦在主题发言中提出了资本项目限额可兑换的观点,即在某一项下(比如直接投资)根据企业的自身情况设定一个额度,额度之内该企业自主进行资本项目交易,与投融资相关的资金进出、汇兑不受限制。

因此,借鉴这个思路,可以在“一带一路”战略

①不成熟的债权国是指中国虽然对外资产规模较大,但是资本的收益率都较低,甚至为负。

②在讨论金融资本输出的时候,其中提到了给沿线国家提供了各项贷款,其中有一部分为人民币贷款,这一部分也可以视为通过信贷渠道进行的货币输出。因此,为了论述简便性,在货币输出这一部分就不重复阐述,这样处理的原因在于将资本输出和货币输出从逻辑分析的角度上分离开。

大开放的背景下适度增加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渠道和规模。比如可以以国内大型公司为载体,在为沿线国家提供融资需求的同时,加大人民币对这些国家的输出。由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薄弱,因此在沿线国家通过QDII渠道进行投资主要是以直接投资为主,这不同于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项下的输出,风险敞口较低。

此外,随着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QDII2)的出台,个人将会通过该渠道进行海外实业投资(如房地产)和证券投资,这也有助于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下的资本项下的输出,对于沿线国家获得人民币流动性以及我国居民进行区域化乃至全球化的资产配置大有益处。

3. 货币互换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央行或者货币当局签订了一系列货币互换协议或备忘录,推动了人民币“走出去”的进程。通过货币互换,有助于沿线国家获得人民币流动性,通过指定该地的人民币清算行或者国内银行在这些国家的分支行行使清算结算职能,从而使沿线国家、企业和居民更方便地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和支付甚至作为储备货币。

表1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货币互换

互换时间	互换国家	互换额度
2014年8月21日	蒙古银行	150亿元人民币/4.5万亿蒙古图格里克
2014年9月16日	斯里兰卡中央银行	100亿元人民币/2250亿斯里兰卡卢比
2014年10月13日	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	1500亿元人民币/8150亿卢布
2014年11月3日	卡塔尔中央银行	350亿元人民币/208亿里亚尔
2014年12月14日	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	70亿元人民币/2000亿哈萨克坚戈
2014年12月22日	泰国银行	700亿元人民币/3700亿泰铢
2014年12月23日	巴基斯坦国家银行	100亿元人民币/1650亿巴基斯坦卢比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报告《人民币国际化2015》。

五、小结

“一带一路”战略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高度出发,做出的一项关于商品、资本和货币三位一体输出模式的重要顶层设计;通过商品输出不仅化解国内过剩产能,而且让沿线国家通过交易获得福利;通过资本输出让国内过剩的资本找到合适的投资场所,提高资本和对外资产(大部分是外汇储备)的收益率,同时推进人民币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结算和支付,也在很大程度上推进货币输出;通过货币输出,有助于沿线国家获得人民币流动性,进而在“一带一路”区域内使贸易、投资更加便利化,减少汇兑成本,提升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治理机制中的参与权和话语权,同时也有助于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降低美元在全球宏观货币金融领域的垄断力。

整体上看,“一带一路”战略在推进“中国式”商品输出、货币输出以及资本输出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商品输出是一种跨境交易,商品与货币同时获得了流通,这主要体现在贸易结算和支付上;资本输出不仅有助于深化人民币投资职能的国际化,让货币更好的输出国外,同时也通过在沿线国家形成资本,降低那些地区经济运行的交易

成本,从而使得商品输出更加畅通;货币输出有助于沿线国家获得人民币流动性,从而可以支付贸易商品和投资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战略是大发展的战略,通过微观经济社会细胞的输出解决国内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问题。

因此,三位一体的“中国式”输出,不仅在理论上嵌合了马克思关于经济社会细胞的论述:即一国若将商品、资本和货币同时输出,意味着对外开放水平处于较高的阶段,已经迈过了单纯依靠商品输出的粗放式对外开放瓶颈;而且也是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复杂形势下打出的一套关于政治、经济和外交组合的“太极拳”,对发达国家主导的传统经济秩序形成一定的冲击,提高了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规则制定权,同时有助于对抗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需要提及的是,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国式”输出的过程中确实具备提纲挈领的指导作用,但是有必要在具体环节做到位。由于沿线国家地缘政治、行政体制、社会风情、生活习惯、语言沟通、文化融合等等均具有特色,在输出商品、资本和货币的过程中,需要较多的考虑这些非经济因素,以免在经济交往中产生不必要的摩擦。

(上接第83页)

(二)审计工作建议

1. 拓思路、提高审计的效率。在审计理念上,将风险和绩效理念进一步内化于审计实践,探索形成一个“合规+内控+管理+绩效”的审计思路。同时,扩大信息渠道,向内部审计检查和外部延伸调查并存的方式转变。在审计方法上积极引入统计分析、对比分析等现代内部审计方法,探索使用计算机辅助审计,提高审计效率。如从再贷款管理信息系统、固定资产管理系统等系统中导出表格,再使用Excel等数据处理工具进行数据分类、筛选等。

2. 分层次、提高审计的针对性。央行资产负债表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和各类业务活动的综合体现。资产负债表健康性审计整体性强、全

局性强、涉及面广,是对内审工作提出的新课题、新挑战。在实际的审计工作中,根据资产负债表项目流动性强弱程度不同、在报告期内发生业务量不同、出现错弊的可能性不同而选择不同的审计策略,分层次、有侧重地探索、研究资产负债表健康性审计的开展方式。

3. 不畏难、提高审计的深度。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账务处理等在各级分支机构有很大的雷同性,如房屋等建筑物的下账和待清理资产、应收未收利息的销账、挂账等,如果审计发现问题则很可能存在普遍性,这种情况一方面提高了审计结果的效用,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问题的整改尤其存在难度。审计开展单位应该不怕难,敢啃“硬骨头”,对普遍性、历史遗留的问题尤其加强关注,并积极探讨整改方法。